

20世纪
欧美文论
丛书

语言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 与形式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许 洁

封面设计:宁成春

ISBN 7-80579-931-8



9 787805 799315 >

语言的牢笼

——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 钱俊义 译

责任校对:许 洁
责任印制:宗 勇

语言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Yu'Yan De Lao Long

Ma Ke Si Zhu Yi Yu Xing Shi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17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宜黄县印刷厂印刷

字数 38.5 万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25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80579—931—8/1·762 定价:22.30 元(平)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

顾问：冯至 叶水夫 王佐良 陆梅林

主编：陈桑

副主编：郭家申 谭立德

编委：王道乾 王逢振 邓光东 白桦

朱虹 刘宁 刘硕良 吕同六

吴元迈 李光鉴 李辉凡 张羽

张玲 张捷 张黎 余顺尧

陈桑 胡其鼎 姚民有 郭宏安

郭家申 秦顺新 袁可嘉 夏致

夏仲翼 钱中文 黄宝生 章国锋

董衡巽 韩耀成 谭立德

(以姓氏笔划为序)

本书责任编辑：王逢振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编辑委员会

语言的牢笼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著

钱 佼 汝 译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著

李 自 修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ACT91/06

总 序

二十世纪是战争、革命此起彼伏的时代，也是科技、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时代的激变给予人们思想意识以巨大震荡，思想意识的震荡又促进了文学艺术和文学理论的千变万化。任何一个世纪没有涌现过如此变化多端的文学流派，任何一个世纪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层出不穷的文学理论。

现在，二十世纪快要走完它的历程，而对于本世纪如此庞杂的文论派别，我们却所知无多。论者往往以此归咎于解放后文化上的“闭关锁国”。但平心而论，解放以前，这个领域也很少有人问津；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上，解放后可说是盛况空前。受冷落的主要是西方现代文论，这确是一个缺陷。它既令人闭目塞聪，难以知己知彼；造成逆反心理，使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理论二者之间产生“新”、“旧”颠倒的看法。更何况马克思主义不应固步自封，它必须全面了解、接触全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或加以改造，或与之斗争，才能使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解放后数十年间，我国文艺理论之很少进展，原因之一或在于此。

诚然，与上升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理论家富于思想性的论著不

同,当代的西方文论流派有许多消极因素,如宣扬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泛性论等等。而且,诸如从新批评以降的当代许多西方文学理论流派,大都是俄苏本世纪初形式主义的苗裔,一般是偏重形式而忽视内容。不过,它们也未始不能给予马克思主义文艺以滋养。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如梅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和卢纳察尔斯基等,都是渊博的通才,是文学艺术的行家里手。只是因为他们以批评活动为思想斗争的手段,往往使美学的批评服从于社会的批评。他们的许多论文虽然闪耀着艺术分析的光辉,却主要侧重于思想分析。因此,西方的一些偏重形式的论著,也不无借鉴作用。当然,这必须经过扬弃,加以消化,而不应囫圇吞枣,全盘接受。

近十年来,我国出版界已开始注意当代外国文论,陆续译介了许多著作。只是选题不够全面系统,译文质量也参差不齐。为了给我国文艺界、理论界和教育界提供一份比较系统比较完善的资料,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精选本世纪以来苏、美、英、法、德、意各国有代表性、有影响、有学术价值的各流派的论著——包括当代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文艺社会学、形式主义、新批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的重要论著,翻译出版。总数定为三十种,力求以这有限的数量,反映出本世纪欧美各国文论发展的基本轮廓,在译文上也力求完善,以信达雅为努力目标。

编辑这样一套比较系统的当代欧美文论丛书,在我国似属首创。我们经验不足,知识有限,虽然得到有关专家和出版社同志多方协助,选题的挂一漏万和译文的差错失当仍在所难免,望读者和专家不吝指正,以利我们不断改进工作。

本丛书系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计划项目，得到中国社科基金会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编辑委员会

如果我们拒绝在语言的牢笼里思考，那我们就只好不思考了；因为我们最远也只能走到怀疑我们所见到的极限是否真是极限这一步……

尼采

译者前言

《语言的牢笼》是詹姆逊较早的一部专著，发表于一九七二年，和前一年出版问世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这两部论著都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但它们在内容上评述的却是两个有着完全不同传统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两套迥异的概念和术语以及两种本质上对立的方法论。

七十年代初，美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都还比较陌生。虽然维克托·埃利希的《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理论》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向美国和英语国家的读者详细介绍和评价了这一对本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流派，但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人物（除早已移居国外的人如雅可布森等外）的主要论著却一直要到六十年代中期之后才陆续译成英语，且以单篇文章居多，种类也很有限。结构主义的情况可能稍好。一九六六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批评的语言与人类的科学”学术讨论会是当时美国的学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把法国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和他们的理论以及他们之间的分歧集中带到了美国，但当时能加入这场讨论的美国人不多。法国结构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和详细介绍结构主义的来龙去脉和基本理论的专著

都到七十年代中期、甚至更晚才出现。

介绍结构主义的书大致有三类：一是论文集，如雅克·埃尔曼所编《结构主义》(1970)、迈克尔·莱恩所编《结构主义论文集》(1970)、和戴维·罗比所编《结构主义引论》(1973)；二是以介绍为主的专著，较突出的有罗伯特·斯科尔斯的《文学中的结构主义》(1974)和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1975)；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则属第三类，它是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框架在思辩的层次上对结构主义整个理论体系进行的观照。这在当时是相当“超前”的。詹姆逊认为“以意识形态为理由把结构主义‘拒之门外’就等于拒绝把当今语言学中的新发现结合到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去这项任务。”他还认为“对结构主义的真正的批评需要我们钻进去对它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才能〕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较为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

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中确实这样做了。他是从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或曰“思维模式”，即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这一头钻进去的。他的“指导思想和自始至终的任务是说明索绪尔的语言学提出的共时方法和时间与历史现实之间可能发生的各种关系”，并对这一理论“作为一种模式和比喻在文学批评、人类学以及最终在哲学本身这些领域中所产生的解放思想的巨大影响”作出评价。

众所周知，索绪尔对语言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最富独创性的是他明确提出的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能指和所指、组合和聚合这四组区分以及贯穿于他的全部理论的双项对立方法论。詹姆逊对索绪尔的理论的评价是把它放在和英美传统的哲学思想和语言观的比较中进行的。他首先指出结构主义语言学就其彻底摆脱英美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经验论和实体论，转向强调关系的系统论这一点而言，是值得肯定的。索绪尔明确指出“语言学恰恰是一

门以没有……实体为特点的科学，”“在语言中只有差异，没有可以正面肯定的东西。”詹姆逊认为这种强调相互关系而不是实体的思想是辩证的，因为它可以靠系统内部的关系产生意义而无须象瑞恰兹和奥格登的理论那样到系统外面去找指涉物。这就是说“不是单个的词或句子‘代表’或‘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而是整个符号系统、整个语言系统本身就与现实处于同等的地位。”

然而，索绪尔的理论也暴露出许多固有的缺陷。詹姆逊指出共时和历时这一对区分索绪尔的理论的支点。当初，索绪尔提出共时概念，针对的是赫尔曼·保罗的唯历史研究独科学的观点，意在扭转这种偏向。不过，詹姆逊认为把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相对立，把共时和历时相对立这种做法“同样是武断的，其方法论的前提也是一种同样武断的价值判断：即‘任何东西只要有一点意义，它就必定是共时的。’在詹姆逊看来，共时和历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开的。他所举的一系列例子都想说明这一点。“尽管索绪尔的理论中也暗含历时模式、突变理论，能够对历史变化作出复杂的和有启发性的生动的解释，但最终还是不能解决把历时和共时在同一个系统中重新结合起来这一根本问题，”因为索绪尔把它们看成“一种绝对的对立，一对永远不可能以任何形式调和在一起的绝对的对立面。”双项对立正是这样一种对立。詹姆逊认为“这种双项对立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辩证法中的对立，更确切地说就是矛盾，是不一样的。前者是静止的对立，不象后者那样与自身以外的东西发生联系。”于是他甚至怀疑在这些永远互不相干的对立面的基础上能否建立起什么系统。即使能够，这些系统也只能让你看到它们所依赖的模式允许你看到的东西。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局限性盖源于此。

詹姆逊对俄国形式主义的评述是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在俄国形式主义中有哪些体现，二

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本身有哪些无法摆脱的困境。

本世纪初,欧洲的语言学和文学研究几乎同时经历了一场反传统的思潮。在语言学中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强调即时和整体的共时语言学对以新语法学派为代表的强调历时和个别的历时语言学的反抗;在文学研究方面则是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客观主义”对以别林斯基、车尔雪尼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波杰布尼亚等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批评。这两股潮流的共同特点,用詹姆逊的话来说,就是“分离出内在的东西,使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跟其它领域的研究对象彻底分家”。这样语言学应该研究语言系统,文学研究则应以“文学性”为对象。

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性主要是形式的问题,通过“陌生化”的手段而获得,而形式又主要是语言问题,因此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对他们有极大的吸引力。詹姆逊指出俄国形式主义关于诗歌语言是日常语言的一种变体,是“对普通语言有组织的暴行”的理论,以及作为陌生化这一手法的心理学基础的“自动化”和“非自动化”的对立都借鉴了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中关于差异和双项对立的理论,即在差异中寻求自身,在否定中确立肯定。这样,正如语言学中意义的确立需要同时考虑在和不在的因素,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的概念必须包括文学和非文学的两个方面,陌生化也必须要有不陌生为其存在的前提。詹姆逊还指出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诗歌与散文不同的陌生化方式,即通过选择改变个别成分的“微观”陌生化和通过组合改变排列顺序的“宏观”陌生化,特别是普洛普的叙事理论中的纵横两个结构层面的理论,都和索绪尔的聚合/组合理论有密切关系。此外,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的演进不是连续的发展而是断续的取代这种文学史观和索绪尔的共时理论中暗含突变的思想也十分相似。

陌生化可以说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核心,詹姆逊对俄国形

式主义的批评也集中于此。首先他认为“只有业已存在的东西——实物、惯例、一定的单位——才能被陌生化，正如只有原来有名称的东西才能失去大家都已经熟悉的名字，突然以陌生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么什么是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业已存在并已为大家所熟悉的东西呢？答案当然是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然而詹姆逊指出，俄国形式主义者不仅“一贯排斥内容，而且总是将一切内容视为形式的投射”，所以“在什克洛夫斯基的著述中从来就说不清被陌生化的到底是内容还是形式。”詹姆逊认为：一切艺术都多少会让人有新鲜感，但不是所有的艺术都会象什克洛夫斯基所推崇的斯特恩的《项狄传》那样把“亮出”自己的“手法”作为自己的全部内容。因此《项狄传》没有典型意义。陌生化作为通向文学性的唯一道路也是站不住脚的。那种认为文学作品表面上有指涉、有内容，实际上谈的是自己的形成、自己的结构的看法才真正是幻视。这也是法国结构主义的一大错误。

詹姆逊对法国结构主义的评述占全书一半以上，显然是本书的重点。他首先指出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虽然都源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却不尽相同。结构主义更关心的是形成系统，建立模式，强调整体性。“结构主义者认为实物或表面现象的历史这种观念已经被模式的历史这一观念所取代”，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自觉的思维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模式的范围内进行的，并且是由该模式决定的。”詹姆逊认为“这一转变和整个科学的中心内容的历史转向是相一致的，……〔而〕科学上这种从感性认识到建立模式的逐渐过渡是符合社会生活本身的一种转变。”由此可见，詹姆逊对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持肯定态度的。

要对结构主义这样一个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并产生出不同理解的哲学问题进行评述，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宏观上，詹姆逊把结构主义理论放在上层建筑和

基础结构对立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中加以审视,认为结构主义研究的是“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但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对基础结构的研究。微观上,詹姆逊“按照符号本身的内部结构,……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研究:以能指的组织为主的研究,以所指为对象的研究,最后还有试图单独提出指意活动本身,开始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初步关系的研究。”詹姆逊把主要力量放在微观研究上,用大量篇幅分节探讨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涉及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人类学,阿尔杜塞和富科的社会历史学,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巴爾特的符号学,格雷马斯的语义学,托多洛夫的叙事学,《泰凯尔》(见本书第134页注)的文学批评,还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等,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结构主义语言学有关能指/所指、共时/历时、双项对立的理论在这些领域中的体现。

正如在评述索绪尔的语言学和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时强调历时和共时不可分一样,詹姆逊十分强调能指与所指也是不可分割的。他批评了割裂二者的做法,因为“我们最终不可能用任何在方法上或概念方面有意义的办法使所指脱离能指。”詹姆逊特别指出结构主义强调能指,强调系统的内指性所造成的后果:即尽管“所有的结构主义者,包括列维-斯特劳斯及其对自然的认识、巴尔特及其对社会和思想问题的关心、阿尔杜塞及其历史意识,都承认在符号系统本身之外本有一种最基本的存在,这种存在,不管它是否可以被认识,都起着符号系统的最后参照物的作用,”但他们却坚持类似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存而不论的“悬置”方法,拒绝指涉物的介入。詹姆逊认为“这不是我们从外部对结构主义所作的一个评价,而是它自身的一个矛盾,因为它的有关符号的概念不允许我们对它外面的现实世界进行任何研究。”这种现象在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反映就是一味排斥内容,或混淆内容与形式的界线。詹姆逊说“结构主义

独有的错误就在于它把自我或者主体当作实体。”只有这样，它才能避免将外部内容引入纯粹表示关系的系统中，才能避免进行解释，最终使结构主义的形式（语言模式）又转变为一种新的内容（语言成为最终的所指）。因此，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的“结构主义批评的最典型的特征就在于把形式转变为内容，”这样，“每一部作品、每一部小说都通过自己的情节结构讲述自己构成的故事，自己的历史。”于是“在结构分析层次上又出现了形式回归到自身的现象和我们在形式主义批评中看到的那种荒谬的自我指定。形式主义批评将作品的形成看作自己最根本的内容，而现在结构主义者又把一部作品的内容视为语言本身。”詹姆逊认为“这并不是个别批评家的偶然所为或独有的癖好，而是这个模式自身固有的一种形式扭曲”，所以“最好把结构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上的形式主义，是现代哲学中无处不在的那种脱离具体内容，脱离各种能指理论的普遍趋势的极点。”

最后詹姆逊又回到宏观审视上，从认识论的高度回顾语言模式这个根本问题。显然，“一种哲学如果自身不包括有关其自身特点的理论，如果不在意识到它所涉及的对象的同时也给某种起码的自我意识留有余地，如果在认识它应当认识的事物的同时不对认识自己作出某种基本解释，那么它必定落到画了自己的眼睛还不知道的下场。”结构主义虽然是一个强调内指的系统，似乎应该有一套自我意识的理论，可以用元语言来谈论自己，然而詹姆逊却认为结构主义的语言模式是一个“在结构上无法产生自我意识理论的体系”，因为语言符号的所指的“无限退行”“表明有一种最基本的对象语言是评论的语言永远不可能企及的，这种对象语言就是语言本身。”因此，“用语言系统来说明现实，用新的语言学术语来重新表述哲学问题，这一选择必然是一个专断的决定，必然使语言本身成为一种享有特殊地位的阐释方法。……应该老老实实地